

孙熙国
著

先秦哲学的意蕴

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

道的抽象与道的秘密
德的抽象与德的秘密
易的抽象与易的秘密

华夏出版社

孙熙国
著

先秦哲学的意蕴

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先秦哲学的意蕴: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孙熙国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5

ISBN 7-5080-4005-8

I. 先… II. 孙… III. 先秦哲学-研究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04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670×970 1/16开本 18.25印张 265千字 插页2

2006年5月北京第1版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导言	1
----	---

上篇 “道”的抽象与“道”的秘密

第一章 “道”的哲学抽象历程	11
一 “道”能够上升和抽象成为哲学范畴的内在根据	11
二 以“道”喻事理——《诗经》中“道”与其本义的分离	14
三 好恶、正直和法则、理义等含义向“道”的渗透 ——《尚书》中的“道”也有朴素哲学抽象的现象	16
四 社会规律和人伦法则与“道”的融合——《左传》、《国语》 中人之道的出现	17
五 自然规律与“道”的融合——《左传》、《国语》中“天之道” 的出现	20
第二章 老子对“道”的发现和提升	22
一 “道”的本体抽象何以可能	22
二 老子对“道”的发现和“道”的本体抽象的完成	28
三 老子“道”论的思维方式	35
第三章 “道”的基本内涵	40
一 “道”具有物质的属性,但它并不是纯粹的物质一般	41
二 “道”无形体,但它并不是纯粹的虚无	44
三 “道”具有精神的属性,但它并不是纯粹的精神一般	46
第四章 “道”的互渗现象与古代哲学的基本形态	50
一 中西哲学发展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	51

2 先秦哲学的意蕴——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

二	物质与精神互渗现象的案例分析(一)	55
三	物质与精神互渗现象的案例分析(二)	66
四	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	72
第五章	“道”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创作和鉴赏	78
一	“道”是中国艺术的灵魂	79
二	山水艺术典型地表现了“道”	81
三	山水艺术产生于“道”	82

中篇 “德”的抽象与“德”的秘密

第六章	“德”的本义与“德”的演变	89
一	“德”的本义	89
二	“德”是一个早于“道”而出现的关乎中国哲学全貌的重要概念	95
三	“德”的含义的演变	96
第七章	德的哲学义蕴的生成	103
一	“德”的最高本体地位的确立：“天德”、“元德”与“德元”	104
二	“德”的最高本体地位确立的另一佐证：“暴德”、“凶德”与“逸德”	108
三	“德”的伦理内涵的出现：“惇德”、“迪德”与“经德”	110
四	“德”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敏德”、“秉德”与“明德”	112
第八章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117
一	“德”得于“道”，“人”“德”统一	117
二	融“德”于“仁”，“人”“仁”统一	121
三	“行”重于“德”，“德”“行”统一	124
四	为政以德，富民教民	128
五	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131
第九章	孔子思想的实质与核心	132

一	正确认识“仁”在孔子哲学中的地位·····	133
二	正确认识“礼”在孔子哲学中的地位·····	137
三	孔子思想的实质核心和最终归宿·····	142
第十章	中国传统德论与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构建·····	150
一	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	150
二	义利双行是儒家道德评价的基本特点·····	155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德的科学构建·····	159

下篇 “易”的抽象与“易”的秘密

第十一章	《易经》作者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175
一	易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本体范畴·····	176
二	阴阳是中国哲学最早用来解释世界的基本概念·····	177
三	类化意象是《易经》作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	179
四	《易经》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头·····	183
第十二章	《易经》与儒家思想·····	187
一	《易经》的比辅亲和思想与儒家合和思想之萌芽·····	188
二	《易经》的敦知临民思想与儒家仁政思想之萌芽·····	191
三	《易经》的观民知政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之萌芽·····	193
四	《易经》的求内与治外相统一的思想与儒家内圣外王品格之融通·····	196
第十三章	《易经》与墨家思想·····	200
一	墨家思想的基本特征·····	200
二	《节》卦与墨家的尚节思想·····	204
三	《颐》卦与墨家的“尚力”和“兴天下利”的思想·····	210
第十四章	《易经》与道家思想·····	219
一	《易经》作者为什么要推崇谦卦·····	219
二	《易经》的贵柔处下和道德内求思想·····	227
三	《易经》的信诚观念与道德内求思想·····	231
四	《易经》中的清虚自守和法则自然的思想·····	237

4 先秦哲学的意蕴——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

第十五章 《易经》的宇宙观与阴阳五行家思想·····	239
一 《易经》作者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定与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观·····	239
二 《易经》作者的“因果联想”与阴阳五行家的认知方式·····	245
三 《易经》的时空观念与阴阳五行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247
第十六章 《易传》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253
一 《易传》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基本精神的塑造·····	254
二 《易传》对中华民族革故去弊、开拓创新精神的塑造·····	259
三 《易传》对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团结统一精神的塑造·····	261
四 《易传》对中华民族顺时而动、居安思危精神的塑造·····	262
第十七章 走出《易经》研究的误区·····	266
一 撩开《易经》的神秘面纱·····	266
二 追索《易经》的人文精神·····	271
三 探究《易经》的时代精神·····	276
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86

导 言

哲学的使命在于对四方上下的探索和往古来今的追寻,并在这种探索和追寻中为人类提供生活的航标,展示思维的行程。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是思,是辨,是追问。但是,哲学的思、辨和问不同于具体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哲学总是用最一般的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我们说,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就在于中国哲学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西方有别,就在于中国哲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概念体系和话语系统。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发生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概念系统产生的历史。中国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在思考宇宙和人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能够统摄并合理地解释宇宙和人生的本体和本原的概念。循此思路,我们对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三个概念:“易”、“德”、“道”,进行了考察。这一考察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发生史,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与奥妙,认识我们的祖先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是大有帮助的。

如果仅从历史的线索来看,“易”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范畴,由“易”推演出的符号系统,就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德”则是在“易”之后形成的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的本体范畴。“德”之后才是“道”。但是,为了遵从今人对中国哲学的把握和理解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分上、中、下三篇,先考察“道”,次考察“德”,最后来谈“易”。

“道”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与之相应的称谓。可是,“道”的本义乃是人“所行道也”,那么,“道”是如何由人行之道这样一个具体对象的名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哲学范畴的

呢？其能够实现上升和抽象的根据又是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一种毋庸置疑的看法，即认为“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出现，理所当然地始自老子。但事实上，早在《左传》和《国语》中“道”就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具体对象的名称——道路——向哲学概念的上升和抽象。具体地说，《诗经》中以“道”喻理，“道”开始与其本义分离。《尚书》中的“道”则渗入了好恶、正直、法则、理义等含义。《左传》、《国语》中社会规律、人伦法则、自然规律逐渐向“道”融合，“道”向哲学范畴的升华和抽象可以说已经完成。老子的贡献则是在此基础上把“道”由一个哲学范畴明确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原或本体概念。

在对老子“道”论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道”具有物质的属性，但它并不是纯粹的物质一般的概念；“道”无形体，但它并不是纯粹的虚无的概念；“道”具有精神的属性，但它并不是纯粹的精神一般的概念。过去我们总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追问，“道”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但是，却忘记了任何哲学概念的抽象和形成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哲学上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的形成和出现，更是如此。因此，在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那里（譬如说老子），不可能有纯粹的物质一般的概念，也不可能纯粹的精神一般的概念。他们在思考物质现象时，总是把精神意志的属性灌注其中；在思考精神现象时又总是借助于物质来表达。在他们那里，物质和精神不是被截然分开，而是水乳交融地混糅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是普通的人和事，他们却赋予了灵性和意志（《易经》尤然），因此，早期哲学家所思考的事物，包括世界本体在内，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物质属性的实体，另一方面这一实体又与人格、意志等精神性成分粘连融合在一起。我们把以老子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家在思考宇宙本体时所具有的这一特征，称做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道”所具有的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不是存在于老子哲学中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古代哲学发展中大量存在的一种现象。认识了这一现象，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围绕老子“道”范畴的唯物、唯心之争会出现“公理婆理”的局面，为什么对古代的哲学家的解读一直就有唯物、唯心的分歧。

关于“德”范畴，前人和时贤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对“德”

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在先秦哲学的发生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估价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往往视“德”为一个伦理范畴,对于“德”所具有的哲学义蕴则关注不够,二是认为“德”是一个在抽象层次上低于道、在产生顺序上晚于道的概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德”的出现要早于“道”字。迄今为止,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道”字,但“德”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甲骨文字集释》收录了“德”的15种写法,《甲骨文编》收录了20种写法。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道”字,出现在西周早期的“貉子卣”里面。在《金文诂林》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有9种不同的写法,“德”则有23种不同的写法,《金文编》收入的“德”的不同写法更高达35种之多。不同写法出现的越多,表明这一概念被不同地域的人使用的频率和范围就越大。

尤有可言者,就“德”和“道”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说,“德”亦在“道”先。“天德”、“元德”、“德元”等概念在《尚书》中的出现,以及《尚书》作者对“九德”说和“三德”说的论述,都表明“德”在《尚书》中不仅已经被抽象和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而且还具有了最高哲学本体的义蕴。这一点与“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在《尚书》中只出现了12次,“德”则出现了114次;“道”在《尚书》中,还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尽管《尚书》作者已经开始用“道”说明社会现象,并寓善恶是非观念于“道”中,如《洪范》云:“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但从总体上看《尚书》中的“道”,与“路”对举,表明《尚书》作者对“道”的抽象大致还停留在与“路”相同的素朴的层面上。“道”被抽象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在《左传》和《国语》中完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德”是一个早于“道”而出现的关乎中国哲学全貌的重要概念。研究中国哲学,应当把“德”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来看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诗经》的时代看做是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因此他对中国哲学的发生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从《诗经》、《左传》和《国语》入手的。如果说中国哲学在《诗经》那里,还仅仅是“结胎”的话,那么,我们的研究则表明,在《尚书》那里,中国哲学已经是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了。

到春秋时期,随着论道的社会思潮的出现,德的哲学义蕴,尤其是德作为最高本体范畴的义蕴,在儒家那里逐渐呈弱化的趋势。就孔子德论来说,德的最高哲学本体的义蕴已极其微弱,其伦理义蕴开始凸显。尽管如此,在孔子那里,德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而存在的。孔子的德源于天道,直接生成于天道。此一思想构成了孔子哲学的前提。从逻辑上说,这是孔子哲学的第一个环节。把外在的天道内化为德,成为人的内在之性,则是孔子哲学的第二个环节。这一环节是通过融“德”于“仁”、“德”“人”统一、“仁”“人”统一的过程来完成的。具有了仁德,成为圣人君子之后,如何把自己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是孔子哲学的第三个环节。这一环节的核心就是把自己的内在之性(仁德)对象化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或如孔子所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孔子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孔子哲学的这三个环节,初步确立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路数和思想特点。对此,我们可作如下表述:

对形上之理的追寻不是中国哲学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中国哲学的逻辑前提。如果说西方古代哲学更倾向于对形上本体的探究和追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哲学来说,知“道”、知“天”,只是其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第一步。知了天道,明了形上之理,掌握了外部世界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把外在之理转化为内在之性,即所谓“化知成识”,从而使人成为掌握了物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圣贤,实现外部世界之理(道)与人的内在之性(德)的统一。只是走到这一步,中国哲学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有进入了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这一层次和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借用《大学》八条目的说法(“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认识把握宇宙人生的形上之理)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环节,诚意正心修身(把外在之理转化为内在之性)是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环节,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内在之性对象化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是中国哲学的第三个环节。

在下篇中,我们集中讨论了《易经》中的“易”范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易”与诸子之学、“易”与中国文化、“易”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之

间的关系等问题。“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先于“德”和“道”而存在的最高哲学本体概念。郭沫若先生是最早认识到“易”是中华民族进行哲学抽象的第一个范畴的近世学者。刘文英先生则从西周天文气象的角度论证了“易”是用来概括阴阳消长的一个哲学范畴。但是，两位学者的这一思想，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甲骨文中，“易”的字形和本义是把满杯中的水倒入另一相对不满的杯中。从“易”的这一本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易”所反映的是大自然中损益、盈缺的原理和法则，它富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易传》明言：“生生之谓易。”“易之为道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根据郑玄《易赞》的说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若《周礼》与郑氏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早在夏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易”作为我们祖先思考宇宙实体的一种观念就已经出现了。桓谭《新论》认为，易、道、元、玄，都是我们的祖先称谓世界本体的不同范畴，“宓戏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孔颖达也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凡此等等，皆说明了“易”是统摄物质世界的最高原理和法则，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本体范畴。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易经》卦爻辞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是古人为了求得一种生活和实践的指导而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实践经验所做的记录和总结。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和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都把《易经》的卦爻辞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循此路径，考察《易经》六十四卦，便不难发现，《易经》产生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那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极其软弱和渺小，人们还没有用以指导其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因而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只好借助于生活中的个别经验。当他们在生活中看到某一现象发生后，继之而来的是另一现象时，日久天长就会把两种现象之间的偶然的先后相继的联系视为必然，并加以记录，这便成了当时的“科学”和“真理”。因此，卜筮仅仅是《易经》的形式，而不是其本质和主流。

千百年来,由于《易经》一直被视为卜筮之书,因此,前辈和时贤虽然承认《易经》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但大多不承认《易经》在总体上是一部哲学著作。由此导致了学界对《易经》作者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或者估价不高,或者大多停留在抽象肯定的层面,而在具体的哲学阐释中,《易经》往往被纳入到《易传》的思想框架内,可以说《易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和人文思想的主体尚未得到充分展开。

《易经》是我们的祖先对物质世界整体的认识和直观的把握。《易经》中的阴阳观念是中国哲学把握世界的基本观念,类化意象是《易经》作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由阴阳、八卦和六十四卦所构成的认知系统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

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把《易》置于五经之首,认为“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易经》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而且是中国文学、史学、伦理、政治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这是由《易经》作者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易经》时代的社会生活 and 实践水平决定的。

我们把《易经》作者认识世界的基本形式归结为“类化意象”。《易经》作者在认识和把握世界时,往往是以“象”喻“意”,借“象”言“理”,以“象”的形式来把握“意”的内容,由此便决定了它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和直观性的特征。由于《易经》是从整体上对世界进行笼统的、直观的认识和把握,后世诸学派则是从某一具体的方面对世界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阐释,因此,如果说《易经》所揭示的是物质世界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即“道之全体”的话,那么,远在它之后的诸子之学所揭示的则是构成物质世界这个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即“道之一隅”。所以,《易经》并不专属于某家某派,它既蕴涵着后来儒家的思想,也蕴涵着后来道家的思想,还蕴涵着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家的学说,它不仅是先秦诸子之学的源头,还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综合源头。

作为对《易经》最早进行哲学阐释的《易传》,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而且对革故去弊、开拓创新、以和为贵、团结统一、顺时而动、居安思危等中华民族其他优良品格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认为《易传》在我们民族

精神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奠定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易经》研究应当坚持走义理与象数相结合的路子。《易经》作者“立象以尽意”,因此,象数和义理皆为《易经》所固有。不言象数则无以明理,不言义理,象数就会泛然若游骑无所归,从而沦于支离和空寂。闻(一多)、郭(沫若)、高(亨)、李(镜池)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易经》,实现了20世纪易学研究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自不待言。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易经》本身所固有的象数的内容几乎被完全抛弃了,《易经》本身所固有的一些内容也就相应地被遮蔽了。

《易经》研究必须走出占筮迷信的误区。《易经》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特别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它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我们今天所见的以《易经》名义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因此,在当前的《易经》研究中应克服本末倒置的现象,坚决反对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热衷于作为《易经》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注意把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使《易经》所带有的占筮形式及后人附会其中的占筮迷信,同《易经》本身所固有的理性和科学的本质内容区别开来,注意研究包含在《易经》中古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信息,注意研究《易经》中所蕴涵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内容,注意研究《易经》同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及其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应该是《易经》研究的方向和出路。



上篇

“道”的抽象与“道”的秘密

哲学起源于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追问和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正是在这种追问和思考中，哲学产生了，人类前进了。因此，对“常道”的不懈思考、追寻和践履，是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永恒使命。

然而，“道”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由人行之道这样一个具体对象的名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哲学概念，并最终提升和抽象成为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体范畴？其能够实现上升和抽象的根据是什么？道是“无”，是“惚恍”，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但它又是如何化生天地宇宙和世间万物的？我们试图通过本篇所做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

围绕老子之道，为什么会出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论争？任继愈先生先是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后来“发现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有困难，改变了观点”，又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这是为什么？老子哲学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不是哲学史上孤立的个案，而是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我们尝试性地提出“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理论,认为在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那里,不可能有纯粹的物质一般的概念,也不可能纯粹的精神一般的概念。他们在思考物质现象时,总是把精神意志的属性灌注其中;在思考精神现象时,又总是借助于物质来表达。认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哲学形态的历史发展,准确地认识中西哲学的一系列范畴(尤其是本体范畴),认识我们的祖先对世界的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